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许钧的文学翻译研究

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 Xu Jun's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宋学智（**Song Xuezhi**）

内容摘要：在以文学“走出去”为先导的文化“走出去”的新的翻译时代，文学翻译活动呈现出从未有的重要性。许钧重视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创新翻译理论，引导翻译实践；执著于翻译的基本问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之问和时代之问，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其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成功之路做一梳理，尝试描述一个与时代同呼吸，具有责任感、使命感和人文情怀的翻译精神主体，期望有助于我国的翻译活动更明确有效、更高质量地服务国家的文化发展。

关键词：文学翻译；许钧；理论与实践；请进来；走出去

作者简介：宋学智，吉林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Title: 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 Xu Jun's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going glob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serves as a major force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elev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Xu Ju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arries ou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guide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explore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essential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in a scientific and contemporary manner, achieving remarkable success. This paper aims at summariz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his practices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drawing the outline of a great translato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mission and humanistic sentiment who advances with the times, providing useful guidance for domestic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serving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more clearly, effectively and with higher quality.

Key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Xu Jun; theory and practice; "bring in"; "going global"

Author: Song Xuezhi, Ph.D.,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Western Languages,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ilin 130117,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French literature (Email: songxzhi@sina.com).

法国文学汉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在老一辈翻译家中，傅雷是杰出的代表，为传递西方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做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一代翻译家砥砺奋进，成长壮大。许钧正是其中一位，他以傅雷为楷模，学习他的翻译作品，研究他的翻译思想。如今，无论在文学翻译实践层面，还是在文学翻译理论层面，许钧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因为他已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生命的追求，一如当年的傅雷，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生命追求结合起来，通过翻译活动呈现出他的赤子之心。从以往的以"翻译世界"为主要方向到今天规模性增加"翻译中国"的新方向，翻译在我国的文化强国和对外发展上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然而当下，我们的翻译实践中还存在着急功近利、浮躁等现象，翻译理论研究中也存在着种种困惑、盲从等倾向，不利于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让我国的翻译活动更明确有效、更高质量地服务国家的文化发展，本文将对许钧的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成功之路做一梳理，探讨他如何突破语言的边界，让文本的生命在异域生成、拓展；如何在一步一步提高自己对翻译的认识的同时，越来越加深自己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如何创新翻译理论，引导翻译实践；尝试描述出从改革开放到文化"走出去"这一路走来的，与国家文化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具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和满满人文情怀的翻译精神主体。

一、从文学翻译实践到文学翻译理论

（一）从高质量的翻译实践起步

谈许钧的文学翻译研究，不可不提他的文学翻译实践，因为他的文学翻译实践是他在翻译领域取得骄人业绩的基础。1976 年，22 岁的许钧到法国留学深造，"被法国语言文学的美深深吸引"，每每遇到好的小说，非一口气读完不可。两年后回国，"面对当时涌动的外国文学阅读潮〔……〕，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特别想把自己喜欢的法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关于翻译的新思考》75）。许钧说："就是这种想要分享的原始冲动〔……〕，让我选择了翻译"（《翻译与翻译研究》248）。1982 年，许钧合译的《永别了，疯妈妈》出版，《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主流媒体和重要的学术刊物相继发表评论文章。此后，许钧在翻译道路上一发不可收，翻译出波伏娃的《名士风流》、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和《贝姨》、雨果的《海上劳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卷四）、图尼埃的《桤木王》、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和《诉讼笔录》、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优秀作品，至今独立或合作翻译出版了 40 余部，愈 800 万字。许钧说："我爱翻译〔……〕当我将倾注着我的赤诚的

爱的译作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时候，我感到幸福，也感到负疚，感到害怕。我总是带着一种负罪感，担心由于自己的无能、失误与笨拙，表现不出法国文学的气质与风采，得不到中国读者的青睐”（《批评与阐释》 240）。这种诚惶诚恐的担心反映了译者在忠诚和热情之外对翻译工作的责任心，促使这位有心人自觉琢磨起如何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再提高翻译的质量。

（二）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探索

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许钧“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障碍和困难”（《翻译论》 1），既有理解层面的问题，也有表达层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热爱翻译，以信为本，追求品质的人，他选择直面问题，寻求答案。对于前者，一些在世的作者如勒克莱齐奥、艾田蒲、博达尔等都是他请教的对象；关于后者，他一方面靠自己摸索，通过对翻译的作品中问题、难点的分类、分析、归纳与总结，写出了“蕴含义的理解与翻译”、“词义的理解与运用”、“简论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基础”等文；另一方面，他有目的地去阅读名家谈翻译的文章，在“傅雷、许渊冲等老一辈翻译家论翻译的文章的启发影响下”（《关于翻译的新思考》 77），通过学习、借鉴、揣摩，写出了“傅雷译文风格得失谈”、“《红与黑》汉译漫评”等文。虽然早期的研究如他所说“大都属于对一些小的具体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往往处于整理与归纳的层次”，“沿用的差不多是语言研究的那种方法”（《谈译论学录》199、194），但成功地解决了“技”的层面的转换问题，开始从翻译小“道”上对翻译实践做出突破性的研究探索。《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开意识流先河的巨著，对于这部“天书”一样难译的传世之作，两年多时间，许钧也才翻译了 20 多万字，但却让不畏挑战、勇于攀登的他，在圆满交卷后，又发表了“句子与翻译”、“形象与翻译”、“风格与翻译”等系列论文，渐渐让他开始”全面地思考文学翻译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翻译论》 11）。

作为一个要毕生从事翻译的人，许钧充分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不会仅仅限于翻译技巧的探讨。他有意识地边译边学，边学边思。他敏锐地注意到，“人们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缺乏层次性的观点”，往往造成“众说纷纭，各持一理”，“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他受严复的“信达雅”三难说和皮埃尔 • 吉罗的（Pierre Giraud）《符号学》中对语言符号的三分法即逻辑符号、语义符号和审美符号的启示，“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的思维层次、语义层次和美学层次”，最后指出：“如果说翻译有什么标准的话，那就是，成功的翻译不可能在一个层次完成，它应该是各个必要层次和谐统一的产物”。他说：谈层次的目的在于，“在理论上为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与其活动规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实践上，要求译者遵循翻译活动的规律，克服不分层次、顾此失彼的倾向，避免翻译活动的盲目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1-11）。而翻译活动中，与盲目性同时存在的还有随意性。许钧认为，“文学翻译之大忌，就是不吃透原著精神，不捕捉其神韵，而掺入过多的主观因素，‘随意’

再创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14）。盲目性和随意性都是给原本就争论不休的翻译标准又带来新的干扰，容易导向“主观生造、乱造、硬造”（《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23）。为此，不断思考与探索的许钧不久又撰写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指出文学翻译再创造涉及四大方面即原作形式因素价值的再现、文化因素价值的移植、文学形象的再创造和语言内部意义的传达，同时提出再创造应处理好四个关系即积极与消极、整体与局部、创新与规范以及客观与主观的关系。[1] 文章让我们对难以把握精准的再创造的“度”，有了一些切实可靠的抓手和切实可循的路径，在理论上，为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许钧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一面继续破解翻译“小道”上“技”的问题，一面也在通往翻译的“大道”上不断摸索和思考。1989 年发表的《论翻译的层面》从翻译的意愿层面、现实层面和道德层面探讨了“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三个制约翻译主体的因素，既表现出一个有责任感的译者对翻译行为的自我反思，也旨在“帮助翻译主体在翻译中清醒地认识、把握好可能面对的各种关系与因素”（《历史的奇遇》 3），告诉我们翻译活动应该是翻译主体所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他进而道：“如果说层次论是自翻译的基础由下而上〔……〕对翻译活动进行内部的、纵向的思考，那么对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的探索则由内部转向外部”，在超越语言的层面，“对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宏观的考察”（《翻译论》 4）与具体的分析。“客观地说，对翻译层次的思考及其主要问题的研究，是我比较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的一个起点和尝试”，而“通过对翻译三个层面的研究，无论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还是对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的了解，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谈译论学录》 201-202）。

（三）开启全面、系统的著书立说

许钧在回顾自己的翻译研究经历时说，自己起初的研究工作围绕一些实实在在的小问题，实属“小道”，“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总体的把握和深层的思考”。因此，他自觉努力、勤奋专研。他注意到当时外国文学名著复译潮中出现的问题，“发现《红与黑》的汉译问题非常具有典型的意义”（《谈译论学录》 199-200），便于1995年积极发起、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持续半年的有关《红与黑》汉译的全国大讨论。对《红与黑》有代表性的几个译本进行比较与研究，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包括“名著复译”、“等值与再创造”、“异化与归化的本土考验”、“直译与意译”等内容。面对当时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百家争鸣，许钧也积极回应，重点观照。相关研究文章和重要的讨论材料最终形成许钧主编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出版。正如作家苏童在书中所说，“其意义远远超过翻译讨论本身”（273），为澄清文学翻译的一些

1　参见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年，第 14-23 页。

基本问题，探索文学翻译的成功之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使许钧对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基础的理论难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创造性的研究，对翻译理论之“道”的认识渐渐有了总体的把握，思考又进了一程。

许钧治学严谨、目标明确。即便《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取得成功，超过预期，如方平所说，“将以它丰富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的文学翻译史册中得到肯定”（《文字·文学·文化》 3），他仍觉得，若想要“就翻译活动做一整体的思考与研究”，还是存在“学术准备不足”、“资料欠缺”（《翻译论》313）等问题。于是，他申请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重点项目“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1998 年起，他就“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国内译坛的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通过对谈的方式进行探讨，让各位翻译家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畅谈各自对文学翻译的独到见解和体会〔……〕。在对谈交流的基础上，对翻译家们的翻译经验、体会进行了梳理。〔……〕对谈与梳理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经验体会向理论思考发展，传统的翻译思考不断得到丰富与创新的理论升华过程”（《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2）。项目成果最终形成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出版。这项成果“可以说是对老一辈文学翻译家的成果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和研究，是对中国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一种探索性研究”（《翻译论》 314），既具有重要实践指导价值，也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它给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指出一条求新务实的发展路径。该书被列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其英译本于 2020 年由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

许钧在翻译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性的成就后，还是认为，凭当时自己的理论素养，难以展开深入研究。于是，他又申请获批了教育部课题“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立项，在蔡毅、郭建中、廖七一等教授支持与合作下，经过几年的勠力攻关，出版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丛书，有《当代苏联翻译理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以及许钧亲自挂帅的《当代法国法语理论》。这套丛书让他对国外近几十年来的翻译研究状况，又有了充分了解和把握。2003 年，许钧推出理论研究力作《翻译论》，从纵向看，它对中国传统翻译活动中的翻译经验、翻译思想和老一辈翻译名家的精辟见解做了认真的梳理总结，提炼升华；从横向看，它对国外近几十年来的译学探索成果和主要翻译学派的前沿观点进行了理性研究和科学借鉴，因而才在《翻译论》中形成自己发扬光大的翻译新论。“书中探讨每一个问题时，许钧都会看似信手拈来地把古今中外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加以引述和点评，最后亮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从中可看出许钧对翻译这一对象思考的深度”（《批评与阐释》 134）。专著集中探讨了七大方面的问题，包括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和翻译价值与批判论。作者“从对翻译的语言层面的研究，到把翻译置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用历史发展的目光去加以审视”（《谈

译论学录》 202），但探讨的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文学翻译，只是站在更高的层面，立足更大的范畴，从更多的视角和更多的维度，来研究探讨文学翻译的本质与价值、目的与使命及其核心与机制。这是许钧“对翻译进行的一次具有尝试性的整体思考、系统梳理与学术阐发”（《关于翻译的新思考》80），是其“二三十年来从事翻译活动，包括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心血结晶”（《谈译论学录》202）。这样一部已经达到“拨云见日的境界”的研究力作，为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文学翻译的理论拓展与深入思考

（一）从译介研究到翻译家研究

《翻译论》代表了许钧译学理论探索的重大成就，但对于一个把翻译活动作为毕生追求的学者来说，绝不等于给翻译研究画上了最终的句号，相反，成为他前行的新起点。他继续在不同层面探索翻译之道。2007 年出版的《20 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从某种意义说，也是对《翻译论》中“翻译过程论”的拓展，因为这部专著突破了我们对传统翻译过程的狭窄的认知，把传统的单单动笔翻译的过程，扩大到包含了翻译的静态结果译本的动态传播与接受纳入研究范围的现代认知。该研究专著不仅承继了一般的法国文学翻译史研究的内涵，也通过作品之选择、译介之影响与制约因素、“翻译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及作家创作”产生作用等“新视野”和“新内容”，给翻译研究打开了新思路，带来“新的进展”，凸显出“独特意义与全新价值”，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统一”（《批评与阐释》 151-152）。作者站在翻译史的高度，融个案分析与总体把握于一炉，对 20 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遭遇的种种“异”的考研进行了发掘与整理，“以发展的眼光，对 20 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为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进一步译介、传播和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考空间”（《批评与阐释》 159-161）。

2016 年出版的《傅雷翻译研究》也是对《翻译论》中“翻译主体论”的又一重要拓展。许钧说：“傅雷的生命是永恒的，一方面源于傅雷的精神伟力，另一方面则源于洋洋大观的傅译作品”（4）。专著从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双重维度，深入探讨傅雷璀璨的翻译世界和其高品格的精神世界，揭示了在翻译家傅雷身上，翻译精神是一种“理想精神”、“拯救精神”、“求真精神”和“艺术精神”（《批评与阐释》189-191）。傅雷通过翻译活动中的选择、定夺、再现等译者行为，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精神追求叠合交融，“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傅雷的翻译精神世界”，揭示了傅雷的翻译精神、翻译思想、人文情怀和生命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通过翻译构建人类的精神世界才是翻译具有人文价值的标志”（《批评与阐释》193）。该著着力于傅雷翻译研究的学术空白处，在明确的学术方向上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开拓，在翻译家傅雷丰满的精神世界里深挖翻译主体，指出了译者行为背后值得研究

和探索的价值所在，获得了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二）从翻译原则到翻译语言

许钧一贯秉承“以信为本、求真求美”的翻译原则。据笔者手头资料看，仅在 2004-2021 年间，许钧在自己的论文中、演讲报告中以及他人的采访或评论引文中，就不下十次地强调过这一翻译原则，因为时下的翻译实践中也出现了美而不忠的翻译倾向，需要引起关注。在他看来，“评判一个翻译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不仅要看他（译者）对词汇的选择，美还是不美，丰富还是不丰富，还要看他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到位。原著词语华丽，还它华丽；原著词语简约，还它简约”（《谈译论学录》111-112）。他对如何处理“美与真”，还具体论道：首先，一般译者有一个“通病”，“即喜欢把原作当中重复的字眼还于其多彩”，这要避免，因为有时候重复“是想赋予其力量”，好比一个“不断重复”的“主旋律”；其次，很多译者“想方设法要把简洁变得美丽、灿烂”，因为“担心别人认为其文字不好”；再次，对于原作中个性化的比喻必须重视，随意“归化”会失去“用词的色彩和节奏”，“失去原来独特的生命”。“因此，我始终把‘真’摆在第一位”（《翻译与翻译研究》229）。许钧是在尊重当中求真，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一个美的东西，只有是真实的反映，才能在欣赏中引人向上或给人正能量。哪怕它很质朴，甚至“初若艰涩”，但经得起审视，因而“渐看渐佳”；一个美的东西，倘若表里不一，去掉了外在的装饰，恐怕会让人败兴，“初喜而终厌”（《傅雷文集 • 艺术卷》 232）。

理论的探索常常围绕着翻译实践。“近几年，我特别关注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2022 年许钧在《翻译与文学论稿》中如是说，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关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我们当下的研究对语言层面的关注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评价混乱，有不少问题没有引起重视，深刻的思考也较为缺乏”（23-24）。我们知道，文学语言的价值就在文学性，文学性恰如雅各布森所说，就是“让语言信息变成艺术品的东西”（25）。然而，在当下的文学翻译中，许钧发现，“恰恰就是这种文学性，这种让语言信息变成艺术品的东西往往难以把握，在语言的转换中，经常被翻译者所忽视，或者因为具有很强的抗译性，而被‘改造’，被大而‘化’之。更有甚者，以通顺、流畅为名，被随意改变”（25）。许钧特别提到了“外语性”一词，它并不是指在翻译活动的语言转换中产生的现象，而是指一部作品尤其一部优秀的作品生成过程中呈现的具有语言个性化创作的文学审美特质，它是“具有语言创造意识的作家”“偏离语言规范”，“超越语言的极限”，“在对一种陌生的语言的追求”中，通过语言句法、句式的创造，让语言“生成 - 他者”（德勒兹语）（27-28），而变得与众不同，别具特色和表现力，因而这种“外语性”既是作家个性化创作的标识，也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所在。普鲁斯特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27），正是最好的解释。所以，“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应该识别并保存原文本的‘外语性’，也就是保存原文本的

'特质'，但却要力戒'翻译腔'"（29）。然而"在外国文学汉译中，凡与母语的习惯表达、习惯句式、习惯比喻有不合的地方，往往被视为'翻译腔'"（30），这一点需要我们警醒、重视。许钧认为，"一位翻译家，如果忽视了作家具有特质性的句式创造，那么在翻译中〔……〕作家所追求的'外语性'自然回被抹杀"（32），而"扼杀了原文的异质性，也违背了翻译为异而生的本质使命"（31）。所以，"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关乎作家的思维、作家审视世界的方式和作家的风格，需要我们加以重视，予以研究"（34）。

三、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的新探索

许钧的翻译活动一直重视两点：一，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二，翻译要服务当下，回应国家的发展战略需求。在我国的文学翻译由最初的以"请进来"为主到如今的"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时代背景下，他积极投入我国中译外研究的学术空白，几乎在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独立或合作发表了"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译入与译出：困惑、问题与思考"、"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关于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几点意见"等文，同时也在不少访谈中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许钧在"走出去"背景下的文学翻译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围绕中国文学外译实践活动展开探讨

1、中国文学主动走出去的必要性

在许钧看来，"文化'走出去'要以文学'走出去'为先导"，因为"优秀文学作品尽管讲述不同民族的故事，却因为始终将人的存在作为终极思考对象而能引起全世界读者的共鸣"。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相比，中国文化对外的输出远远不够。"走出去"活动"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许钧说，"这不是推销自己，而是文化自觉自信的表现"（《翻译与翻译研究》192、199、239）。他认为，"翻译活动一方面要把外面好的东西译进来，同时把我们好东西译出去，这是傅雷的一种精神的重新发扬，要美美与共"。早在 21 世纪初，许钧就说："世界已经到了该阅读中国文学的时候了"；"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就是应该积极主动，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他者需要的呼应"（《翻译与文学论稿》335、332、321）。他强调："不能被动地等待西方汉学家根据他们的需要和意愿来选择翻译中国典籍，而要具有前瞻性，主动承担起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重任"。"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表达了中华民族为推进世界各种文明交流交融的美好愿望，也顺应了丰富世界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时代要求"，"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关于翻译的新思考》202、14-15）。

2、关于文学外译中存在的障碍、困惑等问题

许钧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学者。面对文学外译实践中出现的种

种问题乃至争议等，他旗帜鲜明而又不失说服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实践中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采取的功利主义翻译策略与方法，他明确指出，“把因接受国的文化之隔、心理之隔、心态之隔而采取的一些着眼于当下的变通之策，当作译介的普遍规律或永恒的价值标准去推广”，“值得警惕”。他高度赞同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意见，即对外译介应展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作品（《关于翻译的新思考》104、203）。他认为，“如果‘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翻译‘改头换面’的中国文学，那么这样的‘走出去’到底还值不值得追求与期待”，“很值得深思”。“任何阶段性的翻译方法都是当下的一种选择，不应遮蔽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本质目标与根本追求”（《翻译与翻译研究》53、56）。而对于像“熊猫丛书”“这样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出版物，仅仅以当下的市场销售与读者接受情况来衡量便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关于翻译的新思考》14）。任何接受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他说要理性对待“被接受焦虑”。他还指出，“西方译者的翻译〔……〕比较看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大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至于“有不少中国典籍的译介出现了严重的‘西方化’色彩，曲解、误读中国文化的现象较为普遍”。然而，中国文学、文化主动走出去是要向西方展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东方文化。为此，许钧特别尖锐地指出，“译入行为与译出行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要避免随意套用译入理论阐释译出行为”（《关于翻译的新思考》202-208）。许钧也在提高翻译质量、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翻译、开展翻译模式研究以及加强传播途径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务实、科学、可行的方法与策略。

3、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分析和阐释

翻译是因为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异”，这个“异”包括语言之异、思维之异、文化之异和审美之异等，除了两种语言符号上的“异”之外，它还可能是作者本人的个性化、独特性的艺术创造，或可能是源语国具有的民族性、地方性的色彩。翻译既要消除“异”造成的沟通障碍，又要设法传递出“异”，让对方了解真实的“他者”。无论是对外国文学译入，还是对中国文学译出，翻译都是一场“异”的考验。许钧作为国内较早提出翻译伦理观的学者，把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尊重他异性”翻译伦理观与布特罗斯 - 加利（Boutros-Ghali）的“发展文化多样性”文化观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针对中译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与争议，明确指出，翻译中的“异”离不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翻译的本质“在于自我与他者建立某种联系”。在贝尔曼看来，“翻译的伦理行为在于把‘他者’当作‘他者’来承认和接受”，“尊重原作中语言和文化的异质性”，这种尊重的态度就是对“忠实”的定义。“忠实”与“差异”都是贝尔曼翻译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这个认识出发，许钧指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中的翻译方法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折射的是〔……〕

如何看待语言文化异质性、如何对待他者文化的伦理问题”。所以，“避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遭受误读或曲解”，使走出去的“他者”得到应有的尊重，使其异质性得到保存，“得到真实的、有效的传播”，这既是对翻译“伦理的守护”，也是“抵抗文化霸权”，“坚决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他认为，“中国文学保持自身，其实就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因为差异本身就是价值”（《翻译与翻译研究》45-57、192）。“以易懂、接受为名的任何‘改’或‘编’，都走向了‘异’的反面”。他特别提醒，“一些具有强烈个性的创作，带着中国文化与思想基因和个人对生命独特体验与表达的方方面面，在西方的语境中，是否应该得到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其表现的‘异质性’，是否能在异的考验中开放出新生命之花，是值得我们译学界认真思考、慎重对待的”（《关于翻译的新思考》104-107）。

4、战略上思考相关政策方向

经笔者梳理，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把中国文学外译价值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起来思考“走出去”问题。“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清醒认识外译的意义、目的和作用，把“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作为建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其次，正确体认对外译介所承载的国家意志。传播中国形象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应为走出去的首要目的，“促使中国文化加入世界文化对话与融合，进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为建构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中国力量”（《关于翻译的新思考》83、203-207）应为最终目的；再次，从翻译的历史性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文学外译活动，客观、理性看待谢天振教授指出的当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时间差”和“语言差”现象，重在考量和谋划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未来恒久之道、之效；最后，既要“加强基于文学译介与生成全过程的系统研究”（《翻译与文学论稿》71），把握并提高翻译质量，又要在建立译者、作者、经纪人或出版商家密切联系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并加强译介与传播机制的研究。[1]

（二）新时期对翻译本质、价值与作用、使命以及精神的再认识

1、关于翻译本质

许钧曾在《翻译论》中提出，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五个本质特征，并具有相应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些价值“突显了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翻译的本质属性”（《关于翻译的新思考》9）。在翻译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翻译活动的走向有了新的变化的当下，许钧一如既往地在“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的译道上不断追问，探索与时俱进的新认知。可能由于中国文学外译的新生命的诞生与域外传播情况格外让他关注和思虑，他在原先五个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翻译的“生成性”本质特征，他认为，“一部著作到

1　参见 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中国翻译》6（2010）：5-9。

另外的文化中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要适应新的语境和读者，需要不断成长，所以从译介到传播的过程，是生成的过程”（《翻译与文学论稿》153）。这也充分表现出他勇于完善自我理论建构的姿态。

2、关于翻译价值与作用

许钧说：“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翻译价值问题”。过去对翻译价值的理解，多限于“工具性”之“用”，这种工具性的认识也是导致中国文学走出去中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的原因之一。我们应该看到，翻译为“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许钧认为，建立翻译价值观，要超越翻译的工具之“用”。“打破隔阂，开阔视野，促进理解与交流〔……〕增进不同民族文明的互学互鉴，丰富与繁荣世界文化，（才）是翻译的价值所在。这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对翻译基本价值的一种新的认识”（《关于翻译的新思考》3-7）。翻译对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就在于它是“一种建构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无论外国文学译进来，还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它不仅仅是去再现一种异域的文学形象、民族形象或异国情调，而是要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传递一种思想，让思想异地生根，开花结果。所以，许钧才会深有感触：“翻译在本质上，属于思想之事”（《关于翻译的新思考》 254），他才会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从文字、文学、文化层面扩展到文字、文学、文化和思想的层面（《翻译与翻译研究》 37、145）。翻译即便是文学翻译，也是文化、思想的交流，传承和发展的活动。许钧从“长葆青春的中华文化”延绵不断的发展史中，深刻地理解了季羡林先生感慨的“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又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到翻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着‘无用之用’”（《翻译与文学论稿》 4）。

3、关于翻译使命

2002年5月，加利先生访问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语言多元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许钧说：“加利的演讲对我思考翻译的使命问题有重要启示”。不久，他在《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一文中，结合加利为其《翻译论》的题词“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明确提出，“翻译应该承担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关于翻译的新思考》 80-81）。因为当今的世界化进程中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而要维护文化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是首要条件”（《谈译论学录》 158）。许钧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理解与了解，进而促进其交流与对话，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共同创造人类的灿烂文化，应该是翻译的使命所在，此乃翻译之大道”（《译道与文心》 235）。2014年，他在回答“怎样才能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时说：作为译者，一，在理解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的基础上，应对实践中的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留和传达

文化因素更为谨慎留心；二，要以平等的心态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不能听凭语言的单一化，放任某种“话语”的特权；三，勇敢承担起翻译在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就是最好的落实（《翻译与翻译研究》103-104）。翻译的使命不再仅仅是促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还要让文化交流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那就是在多样性的文化得以维护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促进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为人类和平做贡献。许钧多次强调翻译的这一“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是因为翻译从业者众，要让广大译者明白，“只有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的使命与目的，才能合理使用方法与策略”（《译道与文心》 236）。而且，译者笔下的语言文字已“不再被看作是一种操作性的被动的工具，而是具有能动的创造作用”（《谈译论学录》161）的。

4、关于翻译精神

翻译的精神也是许钧近几年特别关注的一个层面。他曾接受采访说：“翻译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翻译的精神就是打开自身，面对外部世界，去寻找对自身有用，与我们的思想、生活、成长相关的东西，拿来和大家分享，这是翻译最为朴素也最为根本的精神”（《翻译与文学论稿》 321）。简言之，“开放的精神，就是翻译的精神”（《关于翻译的新思考》 84）。从另一个角度，许钧也说：“翻译因‘异’而生，为‘异’而译”，“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所以，“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译道与文心》178）。当然，翻译还具有其他的精神如求真精神等，正如上文对傅雷的翻译精神所做的总结。不过在此，还是有必要结合许钧近年来对翻译的深层思考，进一步发掘翻译的其他精神内涵。许钧坚信的翻译的开放精神，在国家“改革开放”后得到充分发挥，我们打破了原本封闭的自我世界，开放思想，吸收外来，学习与借鉴了他人之长，才有了今天令世人瞩目和羡慕的巨大成就，才有了我们比以往更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因而有了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的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如果说，在传统的请进来文学翻译中的开放精神，是指具有人文情怀的中国翻译家对域外人文精神的传递，在对所求“新”之理解和对所求“异”之包容中，主动沟通引进，从而确定了翻译具有人文精神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化主动走出去，是为了世界文学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为了有助于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壮大而向世界做出的中国贡献，如此，应可以说，有着使命感的许钧等翻译家们已从人文情怀走向更大的“人类情怀”（《翻译与文学论稿》161），翻译的人文精神在当下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又得到发扬光大。

结语

许钧之所以在翻译方面成就斐然，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一生坚持只“做

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译道与文心》 177），心无旁骛。他和傅雷一样对文学翻译情有独钟，不仅热爱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严肃认真，执著求真，而且还都具有创造性转化的过人功力。柳鸣九先生说：傅雷是“一位最有文学史家的价值辨析力与艺术鉴赏力的译家，〔……〕一位优秀文化遗产真正的品味纯正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 2）；许钧用自己的翻译经历寄语年轻的译者们：“一个真正的翻译家应该有发现经典的能力，然后通过你的翻译能够成就经典。要发现原文的价值，通过你的翻译来中国成就经典”（《翻译与文学论稿》 335）。傅雷在翻译过程中与罗曼·罗兰“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达成了精神的契合”（《批评与阐释》 279）；许钧与勒克莱齐奥的交往则是当代译坛的佳话，有力地说明了“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是人类灵魂的共鸣”（《翻译与翻译研究》 219）。

当然，傅雷先生认为，翻译重在实践，要谈理论，最后很容易见仁见智，不了了之，故偶尔只有翻译经验点滴传人（《傅雷文集·文学卷》 227）。许钧敬傅雷先生人品与译品，称他是“译坛常青树”。他接过傅雷先生未尽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而下与形而上贯通，在传统中挖掘承继，在外来流派中广收博取，研究探索，借鉴创新，不宗一派一家，超越一派一家，形成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高峰，正如吕俊教授所说，成为“实践的典范，理论的先锋”（《批评与阐释》 106），这是他对傅雷翻译精神最好的继承与发扬。在翻译中，许钧和傅雷先生一样，都是日日伏案，夜夜挑灯，都有一种孤独的感受，但他们都没有因此而放弃。傅雷先生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傅雷文集·书信卷》 371）。许钧通过自己的苦苦求真，让无数人“从封闭走向开放”，“拥抱了快乐与希望”（《批评与阐释》 272、263），因而也让他天涯存知己。重要的是，许钧从孤独中收获了一份孤诣，对文学翻译高瞻远瞩，有着独到的理解与认识、视野和眼光。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许钧用这个书名是要告诉我们，他把翻译看的重于生命，是生命的“至福”（《译道与文心》177），值得他用一生来热爱、追求和奉献。强烈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构成了他再接再厉、奋斗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他说：“任重道远，我将在翻译与翻译研究之路上继续前行”（《关于翻译的新思考》84）。

Works Cited

傅雷：《傅雷文集·艺术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

[Fu Lei. *Fu Lei's Collected Works (Art).* Hefei: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傅雷文集·书信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

[—. *Fu Lei's Collected Works (Letters).* Hefei: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傅雷文集·文学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

[—. *Fu Lei's Collected Works (Literature).* Hefei: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中国翻译》6（2010）：5-9。

[Gao Fang and Xu Jun.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Going-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6 (2010): 5-9.]

许多：《批评与阐释：许钧翻译与研究评论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年。

[Xu Duo.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Commentaries on Xu Jun'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9.]

许钧：《历史的奇遇：文学翻译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Xu Jun. *The Adventures of History: A Study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Nanjing: Nanjing UP, 2015.]

——：《谈译论学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年。

[—. *Essays on Translatio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9.]

——：《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上海：中西书局，2011 年。

[—. *Fu Lei's Spiritual World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11.]

——：《关于翻译的新思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

[—. *New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20.]

——：《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On Translation*.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3.]

——：《翻译与文学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年。

[—. *On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Hangzhou: Zhejiang UP, 2023.]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年。

[—.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Nanjing: Yilin Press, 1992.]

——：《文字 • 文学 • 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年。

[—. *Text, Literature, Culture. Studie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Nanjing: Yilin Press, 1996.]

——：《译道与文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

[—. *Translation Tao and Literary Mind*.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8.]

许钧、宋学智：《20 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

[Xu Jun and Song Xuezhi. *On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20th 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in China.*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7.]

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

[Xu Jun, *et 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Dialogues on Translatio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1.]

——：《翻译与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

[—.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ollected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 Xu Ju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8.]

——：《傅雷翻译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

[—. *A Study on Fu Lei's Translation Works.* Nanjing: Yilin Press, 2016.]